释“齐气”*

跃 进

一

曹丕《典论·论文》(《文选》卷五十二)云: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骒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杨、班俦也。

李善注“齐气”曰:“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幹亦有斯累。《汉书·地理志》曰:故《齐诗》曰:子之还兮,遭我乎峱之间兮。此亦舒缓之体也。”李善所引《汉书·地理志》见《汉书》卷二十八下,其文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诗·风》齐国是也。临甾名营丘,故《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虖峱之间兮。’又曰:‘竢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缓之体也。”这里,班固、李善均以齐俗“舒缓”的性格来说明“齐气”。类似的文献还见于《汉书·薛宣朱博传》和《论衡·率性》。前者载朱博“迁琅邪太守。齐郡舒缓养名,博新视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颜师古注:“言齐人之俗,其性迟缓,多自高大以养名声。”后者载:“楚越之人处庄岳之间,经历岁月,变为舒缓,风俗移也。故曰齐舒缓。”这里都说到齐人之俗“舒缓”。

而从文学上呼应曹丕“齐气”说者,以刘勰为代表。他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指出:“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幹,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刘勰首先是从“气”的理解入手。清人黄琳评曰:“气是风骨之本。”纪昀评曰:“气即风骨,更无本

* 本文写作得到泰山学者建设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末。”由此看来，曹丕、刘勰都认为，“气”是身体内在的气脉，发之于外则为“风”，即人的内在气质的外在表现，固有清浊之别、高下之分。可惜他们暗含褒贬，却并未对“齐气”有所界说。近人黄侃推寻演绎，认为“文帝《论文》主于遒健，故以齐气为嫌。”刘桢的风格峻朗，故称为“逸气”，乃是赞美之语。在此基础上，范文澜注解刘勰这句话时说：“细审文意，所谓气之清者，即彦和云‘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之风。文风之清，其关键在意气骏爽。故文帝论孔融体气高妙，以融为人性近高明也；徐幹为人恬淡优柔，性近舒缓，故曰时有齐气。”

根据上述诸说，我们不难推想，在曹丕的心目中，意气俊爽的“逸气”与恬淡优柔的“齐气”自有高下之别。故李善称“徐幹亦有斯累”，就准确地点明了这重涵义。在中古时期的文论术语中，“累”，往往又是“病”的同义词。如锺嵘《诗品》上品所说“晋黄门郎张协诗：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有时，锺嵘又单称此为“累”，如序称：“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又如中品称何晏、孙楚、王赞：“平叔‘鸿雁’之篇，风规见矣。子荆‘零雨’之外，正长‘朔风’之后，虽有累札，良亦无闻。”①当然，徐幹的作品是否为“累”，齐俗的“舒缓”是否为累，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曹丕对此持否定的态度，也只能说明他一人的审美取向，不足以据此论定徐幹创作及齐地风俗的优劣是非。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所要关注的，应当是这种创作风格的主要特质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和文化背景。

为此，我们不妨先从比较中说起。

建安七子中有四位属于齐鲁作家：孔融（153-208）曲阜人，王粲（177-217）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刘桢（175？-217）东平（今山东宁阳），均属鲁地。只有徐幹为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属于齐地。四个人的创作固然有许多相近之处，但也有很多差异。关注这些差异，可能有助于我们对于“齐气”内涵的理解。孔融的为人特性与创作风格，我们在《“鲁学”解》（待刊）中有所涉及。王粲诗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最能震撼人心。《七哀诗》三首就是这样的作品。初平元年（190）董卓劫持汉献帝和朝廷百官西迁长安，王粲父子亦被裹挟而去。在董卓的暴虐统治下，长安朝中人人自危。初平三年，司徒王允收买董卓部将吕布杀死董卓，自己又被董卓另两个部将李傕、郭汜所杀，长安一片混乱。王粲有感于西京扰乱，虽司徒所辟，诏授黄门侍郎皆不就，而是南下荆州，托命于刘表。《七哀诗》大约就作在此时。在投奔荆州的路上，诗人亲眼目睹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悲惨现实，感受了生离死别的撕心裂肺，“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

①参见拙文《一桩未了的学术公案——对锺嵘〈诗品〉“滋味”说理论来源的一个推测》，《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学苑出版社，2000年。

两相完?”真可谓惨不忍睹。刘桢“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1]钟嵘《诗品》列他为上品,称他:“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诗现存十二首,《文选》选录十首,可见当时人对他的重视。《赠从弟》三首分别用蘋藻、松柏、凤凰作比,鼓励他的从弟坚持人格节操。由此,可以看出刘桢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从王、刘的创作中可以看出两点鲜明特色:第一,追求强烈的现实感受。第二,注重崇高的人格修养。而这,也正是儒家创始者追求的终极目标,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意义正在这里。相比较而言,徐幹的创作与此颇为不同。虽然同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其表现形式则委婉得多。他的诗歌创作,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三首,即《答刘桢诗》、《情诗》、《室思》[2],他通过诗歌表现的并非都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而是表现自己的情感体验。譬如他的最为传诵的作品《情诗》和《室思》,就仅仅限于自身,绝不像王粲、刘桢那样具有重大的题材。如《室思》第三章“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几句历来为人传诵和模仿。《答刘桢诗》也是如此,文笔舒缓,娓娓道来,给人以清丽哀惋的感觉。这符合前人所说的“舒缓”的“齐气”要求。

当然,徐幹的创作也并非单一色调。譬如他的赋,曹丕评价甚高。所谓“幹之《玄猿》、《漏巵》、《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可惜的是,这里提到的四篇赋,多已失传。唯独《太平御览》卷七〇二还保留《圆扇》残存的四句,据此,自然无法与张衡、蔡邕的辞赋创作相比。就其保存比较完整的辞赋而言,依然可以鲜明地体味出另外一种情怀。现存残篇零简凡八篇,《齐都赋》保存的文字最长,如称齐国乃“实坤德之膏腴,而神州之奥府。”就流露出对家乡的美好记忆。《西征赋》也残留了十馀句,颇寓十分自许之感:“伊吾侪之挺力,获载笔而从师。”这种自负之情,在《七喻》中亦有反映,其中借逸俗先生的形象,表现自己“万物不干其志,王公不易其好”的志向。这些辞赋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颇有夫子自道的意味。特别是被曹丕称为“成一家之言”的《中论》更具有沉潜的特色,符合古人对议论的要求。全书二十篇,条分缕析,论述了当时士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核辩》篇,分“俗士”之辩和“达道”之辩,以为“俗之所谓辩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声气,繁其辞令,如激风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论是非之性,不识曲直之理,期于不穷,务于必胜。”即俗人之辩,追求语言表达上的气势,伶牙利齿,而不在乎其内容是否得体。与此相对照的是达道之辩,“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这种人,“木讷而达道者,虽口屈而心不服也。”这种思想原本于《老子》“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之说,这也正是徐幹本人的真实写照。诚如曹丕《与吴质书》所说:

---

①曹丕:《与吴质书》,见《文选》卷四十二。

②另有《为挽舡士与新娶妻别》,《艺文类聚》作徐幹,而《玉台新咏》作魏文帝。这里略而不计。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馀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徐幹《中论》辞义典雅，特别体现在《治学》一篇。他秉承王充等人的观念，认为儒生也有高低之别，有通儒，有鄙儒。“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这里更强调的是一个“通”字。齐地大儒郑玄正可以用一“通”字来概括其成就。《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郑玄别传》说，郑玄十三岁就诵通五经，好天文占候。成年后又博极群书，精通历数图谶之学。稍过而立之年，就以为山东已无足问道者，乃西入关，与涿郡儒学名家卢植一起，师事扶风马融。后来遍注群经，更体现了这种融会贯通的意识。不仅贯通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贯通儒家学说与道家思想，而且贯通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因而得到了齐鲁两地学者的高度重视，譬如孔融为北海相时，为表彰儒术，特为郑玄立一乡，称郑公乡[①]。

由此看来，“齐气”内涵除“舒缓”之外，还应有潜在的自负意识和明快的贯通意识。而这些带有明显地域性的齐俗特征，又与齐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二

《战国策·齐策》载苏秦对齐宣王说：“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若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南有泰山，北有渤海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们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行为方式。

我们在《“鲁学”解》一文中曾经指出，姜太公治齐是“因其俗，简其礼”[②]，即很大程度上保留东夷的文化传统，在其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若干鲜明的地域特点与文化品格，在当时独具特色。战国中后期，齐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稷下门云集了众多的文人学士，可谓盛况空前。《风俗通义·穷通》：“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具体提到了若干名人：“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事实上，名人远不止这些[③]。到了战国后期，其代表人物是鲁国的孟子和来自赵国的荀子。徐幹《中论·亡国》：“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赵人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④]。六国时代，见于《汉书·

---

①见《后汉书·张曹郑列传》。

②《史记·齐太公世家》。

③参见张秉楠：《稷下钩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④《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艺文志》著录的重要作品有：诸子略儒家类《公孙固》一篇[①]，诸子略道家类《田子》二十五篇[②]，《捷子》二篇[③]，诸子略阴阳家类著录《周伯》十一篇[④]，而最重要的当然要数“齐有三驺子”，即驺忌、驺衍和驺奭。《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有三驺子。其前驺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国政，封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驺衍，后孟子。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馀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驺奭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阴阳家类著录《邹奭子》十二篇[⑤]，《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阴阳家类著录《邹子》四十九篇[⑥]。又有《邹子终始》五十六篇[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其悠久的文化传统和辉煌的文化创造，就使得齐人具有一种特别的优越感。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将王贲擒齐王建，《资治通鉴》卷六《秦纪》载：“齐人怨王建不早与诸侯合从，听奸人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刘邦灭齐后，田横赴京，其五百馀人自刎岛上。其悲壮性格颇与楚人相近，这又不是仅仅靠“舒缓”二字所能解释。

行文至此，似有必要述及《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一则资料。该文也用“宽缓阔达”概括齐人舒缓的特征，但同时又特别指出，齐人还“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就是说，除了宽缓之外，齐人还具有下列特征：

第一，所谓“具五民”，有两种解说，一是服虔所说，指士、农、商、工、贾等不同行业，无所不包。二是如淳所说，“游子乐其俗不复归，故有五方之民”。即各地方的人汇集于此。因此，“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尽管对“具五民”的内涵理解有所差异，但就总体而言，这种特性表现为一种开放包容而又觊觎财富的性格，这与鲁人相对保守的性格形成鲜明对照。正如《战国策·齐策》所说，齐都“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

---

①班固注：“十八章。齐闵王失国，问之，固因为陈古今成败也。”

②班固注：“名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

③班固注：“齐人，武帝时说。”王念孙《读书杂志》卷五：“按《古今人表》捷子在尸子之后，邹衍之前。捷子乃六国时人，非武帝时人。‘武帝时说’四字，乃涉下文条注‘武帝时说于齐王’而衍。”

④班固注：“齐人，六国人。”

⑤班固注：“齐人，号曰雕龙奭”。

⑥班固注：“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

⑦颜师古注：“亦邹衍所说。”

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各地人才，不同阶层，行业精英，市井民众，无不汇聚齐地，智略凑辐，濡染熏陶，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养成一种敢为人先的超前意识。

第二，所谓“怯于众斗”，即不善于打群架，这与鲁人讲究群体性不同。齐人的这种强调独立的性格，如果从事学术文化创造及商业活动，可能是一种优势，而在战争中就往往表现为劣势。故《汉书·地理志》谓其“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史记·孙子吴起传》引孙膑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所谓“怯”，不是胆小，而是力单。

第三，与“邹鲁守经学”相应对的是“齐楚多辩知”[①]，亦即上文所说的“足智好议论”。如《汉书·地理志》称其“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淮南子·要略篇》也有近似看法，认为齐国“民多智巧”《中论》第八篇为《核辩》，第九篇为《智行》，就是分析当地善论辩的习俗。如前所述，徐幹并不赞同齐地俗人之辩，而更重视达道之辩。达道，就要有“智”，为此，他例举了历史上“蹈善而少智”的人物悲剧，认为明哲之智优于志行之士。这种智慧，如果加以引申，就表现为富于变通的精神，表现为注重独创的意识。陈直《西汉齐鲁人在学术上的贡献》列为九项：田何、伏生等的经学；褚少孙的史学；东方朔的文学；仓公的医学；尹都尉的农学；徐伯、延年的水利学；齐人的《九章算术》；宿伯年、霍巨孟的雕绘；无名氏的书学[②]。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又据《汉书·艺文志》补充了师氏的乐学，《律历志》所载即墨徐万且的历学，《曹参传》所载的胶西盖公的黄老学等三项[③]。上述九项，主要都是齐人的创造。

第四，滨海的独特环境，使得齐人富于幻想。《管子·封禅》最早提出了封禅说是基于对天神的崇拜和对山神的想象。齐威王、齐宣王时的邹衍“论著终始五德之运”，“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所有这些夸诞虚幻的叙说，极大地吸引了历代帝王的兴趣。《史记·封禅书》记述秦汉时期帝王东游海上祭祀名山大川及“八神”，即：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四曰阴主，祠三山，即东莱曲成参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时主，祠琅邪。所有这些神仙胜境都集中在齐地，由此不难看出齐人鼓吹的巨大效果。大规模的祭神活动始于秦始皇，而盛于汉武帝。秦人佞神，固有缘由。历史上关于秦人的起源有东西两说。所谓东来说，即源于东夷，主要在今天山东半岛莱芜一带，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曾是齐鲁交界之处[④]。如果

---

①《汉书·邹阳传》。

②《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③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④参见柳明瑞：《嬴姓溯源》，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

是这样的话，秦人与齐俗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第三个年头，就派遣徐市等数千童男女入海寻找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①]。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对其荒诞的行为有所理解。《史记·封禅书》称："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燕人，与齐人相近，环渤海而居。

第五，齐地是黄老之术的发源地。楚汉相争之际，齐地原本封韩信为王。刘邦平定天下后，田肯上书曰："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这段话深刻地说明了齐国重要的地理位置及其对于新朝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意义。为此，高祖六年（前201），刘邦特立长子刘肥为齐王，曹参为相，成为当时最大的封国。《史记·曹相国世家》载："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由此看来，齐地在其原有的文化传统中，又融入了具有时代特色的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重在清静无为，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我无为，民自化；我好静，民自正。"汉惠帝二年（前193），曹参入相，将黄老之术推行于全国。其继任者陈平虽非齐地人，但依然"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这种思想所以能够为统治阶层所接受，除了当时百废待兴、人心思安的特殊历史环境之外，还应当从君臣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从吕后这方面说，她所以接受这样一种清静无为之术，其真实目的恐怕在于借助这种主张有效地抑制武力功臣的野心。"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汉书·儒林传》）对于吕后而言，这些人确实是一股强大的压力。从曹参、陈平等武力功臣方面说，他们倡导黄老之术，显然不仅是一种空洞的说教，而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手段，更是一种韬光养晦的谋略。刘邦死后，吕后欲立吕氏为王，当廷问左右丞相和太尉绛侯周勃。王陵以"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盟约一口回绝，而陈平、周勃则当面违心应承。面对王陵的质问，陈平说："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后，君亦不如臣。"此后，"为丞相不治事，日饮醇酒，戏妇人"，麻痹了吕后的警惕，放松了对他们的钳制。这样一种特殊的相互制约的机制，形成了惠帝、吕后在位十馀年间君臣相安无事的局面，给人一种天下无为而治的印象。故《汉书·高后纪》赞曰："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然而

①有关徐市的研究文献，可参见《徐福研究论文集》，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8年。

吕后一死，陈平、周勃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诸吕一网打尽。文帝登基后，按功行赏，陈平将右丞相位让给周勃，自己居左丞相，屈居第二，依然采取一种回避退让策略。陈平自称："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这就是所谓黄老之学的实质，发源于齐地，影响到全国。

齐俗以"舒缓"为核心，齐人充满自负心理，齐地强调融通意识，都可以从上述五个基本特征得到解释。

三

要想准确地把握汉魏六朝时期"齐气"的内在发展脉络，从齐俗入手之外，还应特别关注"齐学"的融通特色，因为"齐气"与"齐学"之间，也有着重要联系。

《汉书·儒林传》两次提到"齐学"概念，一是指济南伏生的《尚书》传授，二是指公羊学。汉代初年的传授以济南伏胜《今文尚书》为大家，影响于齐、鲁之间。从此，齐地学者颇能言《尚书》。其后人伏理、伏湛，伏黯，伏恭，伏无忌，并以齐学著称。伏理，为当世名儒，以《诗》授成帝，为高密太傅。伏湛少传父业，教授数百人。伏湛弟伏黯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伏恭太常试经第一，拜博士。其父伏黯章句繁多，伏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伏无忌亦传家学，博物多识。曾与黄景、崔寔等参与《东观汉纪》写作，又自采集古今、删著事要，号曰《伏侯注》。伏氏家族开始由经学转向史学。《公羊学》是齐地的看家学问。《汉书·儒林传》："胡母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公羊学大师有董仲舒、公孙弘等人，他们的传授不仅仅局限于学者范围，而是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实用哲学，从而在两汉政治生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①。

"齐学"的内涵当然不仅仅限于《尚书》和《公羊传》。从《秦汉区域文化的划分及其意义》一文的统计来看，齐地学问尤以《易》学擅长②。其中的原因很容易理解，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对此，我们在《"鲁学"解》中有所涉及。在《诗经》学方面，后苍创为《齐诗》，影响极为深远。后苍，字近君，东海郯人。师事夏侯始昌。《汉书·艺文志》："《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应劭注："申公作《鲁诗》，后苍作《齐诗》，韩婴作《韩诗》。"后苍有三大弟子，即翼奉、萧望之、匡衡。翼奉，字少君，东海下邳人。治《齐诗》，纯学不仕，好律历阴阳之占。《艺文志》孝经类著录《翼氏说》一篇，姚振宗以为作者即翼

①参见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②拙文《秦汉区域文化的划分及其意义》，《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奉。萧望之(前107-前47),字长倩,东海兰陵人。治《齐诗》,师事后苍近十年。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为元帝时一代名臣。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人。父世农夫,至衡好学[①]。元帝初年为博士,给事中,作《上疏言政治得失》,"议论滚滚,皆圣贤道理,词复宣畅。"[②]建昭三年(前36)代韦玄成为丞相,封乐安侯。其议论文字颇代表汉代风尚。故真德秀评曰:"衡之奏对,在汉儒中论议最为近理,可为仲舒之亚。"[③]

此外,在《论语》学方面有王吉的《齐论》,在当时独树一帜。王吉,字子阳。琅玡皋虞人。少好学,以郡吏举孝廉为郎,补若卢右丞,迁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中尉。在《上宣帝疏言得失》文中提出"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俭"的著名主张。《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语》类著录《齐说》二十九篇。又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颜师古注:"王吉字子阳,故谓之王阳。"王先谦《汉书补注》:"下云传《齐论》者,惟王吉名家。《吉传》云:王阳说《论语》,即此《齐说》也。"《文心雕龙·奏启》:"若夫贾谊之务农,朝错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观礼,……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

从上述学术文化传统看,"齐学"不主故常,追求贯通风气,这与齐俗"多辩知"的传统不无关系。这种学术背景,影响到文学创作方面,就表现出与鲁地迥异的风格。如前所述,齐俗智略多谋,譬如邹阳,《汉书》本传称其"为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后来,羊胜、公孙诡等人出于妒嫉,向梁孝王进谗言。邹阳入狱后作《上书自明》,辩难质疑,扬厉奋发,颇有齐俗"辩知"之风。同样是齐人的羊胜、公孙弘等人也是如此。《史记·梁孝王世家》称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这是我们阅读有关齐地文学家史料而留下的最初印象。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受到黄老之学的影响,齐地的道家文化向来发达[④]。道家文化对于文学创作方面的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而诙谐隐语则是其中之一重要体现。汉武帝时期的东方朔和主父偃可推为代表。

---

①《西京杂记》卷二:"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衡能说《诗》,时人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鼎,衡小字也。时人畏服之如是。"

②《秦汉文钞》引林次崖评语。

③《秦汉文钞》辑《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后引真德秀评语。

④详参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他的创作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重要方面，一是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另外就是仕途不顺时的无奈与自嘲。武帝初即位，诏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文士多上书畅言得失。时年二十二岁的东方朔上书自荐，称："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尽管文辞畅达，但是颇怀不逊。武帝尽管爱其才而并未重用他。二十四岁那年，吾丘寿王上奏扩充上林苑，东方朔作《谏除上林苑》提出相左见解。五十馀岁临终时又作《临终谏天子》依然表现了他的积极态度。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东方朔正直的品格。唯其如此，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仕进。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两篇最著名的自嘲文章《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汉书》全文载录后，班固特别指出："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在当时，东方朔的为人轶事及其文章都在世间广为流传。《汉书·东方朔传赞》载："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而杨雄亦以为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然朔名过实者，以其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非夷、齐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汉书·东方朔传》就记载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譬如郭舍人与东方朔以"隐语"争胜，"舍人所问，朔应声辄对，变诈锋出，莫能穷者，左右大惊。"唐代颜师古注："隐谓隐语也。"《汉书·艺文志》有《隐书》十八篇。世谓之廋辞，亦谓之谜。《说文解字》："谜，隐语也。"《文心雕龙》说："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类似的文字游戏，虽然早见于先秦，而汉代尤盛。如孔融六言诗隐含郡县名，蔡邕题碑"黄娟幼妇"暗含"绝妙好词"之类都是如此。此外，《太平经》、《越绝书》、《周易参同契》等均有隐语。魏晋以后的江南民歌中的隐语，均与此有关①。不仅如此，后来流传的很多著作如《十洲记》等，即属"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东方朔逐渐由普通文人而一跃成为了中古小说中的重要文学形象，后来又成为道教著作中的仙人。这当然是东方朔所始料不及的。

主父偃是齐国临菑人，年轻时学长短纵横之术，晚年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游历于齐地诸子之间。家贫无所得，又北游燕、赵、中山等地，皆一筹莫展。元光元年（134），西行入关，拜见卫青将军之后而发迹。他的文章，《汉书·艺文志》诸子纵横家类著录《主父偃》二十八篇，今存文三篇，也多诙谐幽默的

①参见拙文《道教的流传与江南民歌隐语》，《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学苑出版社，2000年。

风格。

与此相关联，就是谶纬之风由齐地向全国的蔓延。谶纬之说虽然起西汉末年，而秦汉之际的符瑞之说乃是其萌芽。《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将军骜死。以攻龙、孤、庆都，还兵攻汲。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史记正义》引《孝经内记》云："彗出北斗，兵大起。彗在三台，臣害君。彗在太微，君害臣。彗在天狱，诸侯作乱。所指其处大恶。彗在日旁，子欲杀父。"《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所谓"图录书"实乃后世谶纬之类的书籍。后来符瑞转而成谶纬，成为两汉之际学术思想的重要特征。谶纬之学的作者，很多与齐学相关。《春秋说题辞》："传我书者公羊高。"（《公羊传》何休解诂序疏引）《春秋演孔图》："公羊全孔经。"（《初学记》卷二十一引））故《论衡·案书》："谶书云：董仲舒，乱我书。"谶纬文献中多次提到公羊高和董仲舒，而两人又都是"公羊学"的领袖。如西汉昭帝元凤三年（77），议郎睢弘上疏："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这段话见《春秋元命苞》："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主。"由此推想，公羊学派的后学很可能有一部分人直接参与了谶纬的撰写工作。相关文献，钟肇鹏先生《谶纬论略》例举了很多[①]。如前所述，公羊学与齐地本来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看《开元占经》多有类似记述，微引著作，多出齐人之手，或者转述齐人的论调。根据东汉时代引用谶纬文句的碑刻地点，及《汉书》、《后汉书》中通晓谶纬者的籍贯，结果也以齐地为多[②]。因此，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符瑞、谶纬之学，至少与齐俗、"齐气"、"齐学"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关联。谶纬的本质，就是依据宗教神秘的想象来比附现实生活，来预示吉凶祸福。这在政治上当然是荒谬的，而在文学上的意义，似乎还不宜遽然否定。否则《文心雕龙》特设《正纬》专篇就不可理解。当然，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本文只是围绕着"齐气"而钩稽了若干史料，弥缝折衷，比类成编。深入系统的探讨，还有待于来日。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

①参见钟肇鹏：《谶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②参见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中华书局，2003年。